

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 简 报

(第 8 期)

2024 年 8 月

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编印

本 期 要 目

- ◆ 课程教材研究的价值体现
- ◆ 政策制定与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 ◆ 教材建设和管理的经验与思考

本期速览：2024 年 7 月 3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开展了“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线下学术活动，来自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的资深专家申继亮教授带来了题为“关于课程教材研究的几点思考”的专题讲座。本次活动由高潇怡副院长主持，张春莉院长为申继亮教授颁发了聘任证书，正式聘请申继亮教授为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及其他单位院系的近六十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论坛活动。

本期详情：

申教授以其深厚的工作与研究背景，为现场师生深入剖析了课程教材研究的重要价值，并分享了当前在教材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宝贵经验。同时，他针对目前教育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教育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政策制定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最后，申教授结合 ChAT GPT 带来的挑战与思考，为未来的教材研究指明了明确的方向。

一、课程教材研究的价值体现

本次讲座的核心内容是针对当前课程与教材研究领域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讲座伊始，申继亮教授基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深厚研究背景，指出尽管这两个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但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研究课程教材时必须遵循学生的发展规律，而要了解这些规律，就需要进行严谨的科学探究。申教授进一步强调，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情况的数据资料显示，尽管当前的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项目和高质的研究成果，但现实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现状使得申教授提出了“课程教材研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这一深刻的问题，以激发听众对课程教材研究意义的深入思考。

接着，申教授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出发，为听众提供了一些研究课程教材时需要关注的关键方向。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在各个年级的中小学教材中准确设定难度？”、“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进行科学评估？”以及“在统一规范课程教材的同

时，如何兼顾学校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教材、教辅、课外读物、课程资源几者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处理课程教材共同要求与个性多样？”、“如何处理课程教材相对稳定与与时俱进？”等等。这些问题涉及到了课程教材研究的多个层面，为在场的学者和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素材和研究方向。

二、政策制定与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制定的问题领域未被研究关注和解决

随后，申教授凭借他丰厚的实践经验，为我们详尽地讲述了他亲自参与政策制定的真实案例。他特别强调，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例如概念的混淆、内容要求的模糊不清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共同去面对和解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当前的研究还显得不够充分。

申教授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他提到，一方面，源于研究者视角的局限，未能从更高的站位审视问题，以致未能深入理解中央文件的深层内涵。尤其是文件中常常被忽视的原则和价值观，虽然这些文字简短，但却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涵。研究者们只有深入地研究和探究，才能真正地理解文件的实质，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研究学生道德发展的专家，需要深入研读 2014 年 10 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02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才能对道德教育领域的研究方向有所理解。再比如，研究学生学习的专家需要深入研读中小学课程标准研究创造力的专家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家需要不断学习《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22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17 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等，这也给现场相关领域的师生提供了未来学习和研究的方向。

另一方面，申教授指出，将中央和教育部的文件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内容，是一

项充满挑战的任务。这些文件作为上位概念，需要在课程和教学中进行具体化和集中。研究者们需要巧妙地将文件的语言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的语言，将抽象的、理论的概念转化为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进阶表述，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字内涵对于小学生极其抽象，那么如何变成小学阶段学生应该掌握的概念就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所在。此外，还要将上位的教育要求转化为实际可行的学习活动。

以四个自信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例，申教授详细阐述了这些抽象概念如何与中小学的课程和教学相结合，使学生真正理解其内涵。这不仅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我们培养新时代优秀人才的关键所在。

（二）科学研究难以影响政策制定

通过中国知网搜索“教材研究”关键词，获取 2019 年至 2023 年间相关研究的发文量统计结果。搜索结果显示，在这五年间，共计发表了 10562 篇相关研究论文。那么如此丰富的研究项目为何难以在政策决策中采纳，帮助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与目前研究的质量有关系。

根据一项国际深入的分析研究报告的细致比对结果显示，中国与美国在高等教育期刊论文的多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在参考文献方面，国外一篇研究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数量高达五六十篇，显著超过我国同类论文的引用量，显示出国外研究在文献积累上的丰富性。其次，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我国论文更多地依赖于理论思辨，而与美国相比，我们在实证研究或与实证结合的理论研究方法上的运用明显不足。再者，从数据收集方式来看，我国研究者普遍倾向于采用他人已有的研究数据，而美国则更倾向于通过问卷、访谈等原创方式收集新数据来验证研究假设。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数据分析方法的使用情况上，也能够直观反映出两个国家在学术研究水平上的差异性。从数据分析的水平来看，可以分为基本层次、中间层次和高级层次。基本层次是指研究者普遍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以此来描绘和展示各种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或者现象。这种方法是研究的基础，有助于我们对研究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当深入到中间层次时，即需要通过组间比较来进行统计分析的阶段，比如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t 检验、卡方检验、相关检验等方法，在更高级

的层次上，研究统计分析开始运用更为复杂的数学模型，使用如回归分析、多重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SEM)、多层次线性分析模型(HLM)等统计方法来分析数据，这些方法能够更深入、更精确地分析数据，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据统计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我国研究者的数据分析方法仍停留在基本层次，这不仅显示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不足，也表明了我们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在高级层次的数据分析方法使用上，可以看到我国与美国的研究者们存在明显的差距，美国的论文在数据分析方法多数都属于高级层次分析，而我国的研究者在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训练和经验积累相对不足，导致我们在利用这些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时的能力较弱。因此，我国的研究者们需要加强对高级统计分析方法的学习和应用，以提高我国在实证研究领域的整体水平。

申教授进一步强调，政策制定者在采纳专家研究成果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这个障碍的根源主要在于，目前大量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存在一种偏重理论而忽视实证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研究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和全面的数据支持，这无疑对研究的可信度和影响力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在现代科学研究的框架内，科学研究应该是形式逻辑和实验科学的有机融合，研究过程必须严格遵循逻辑化、量化、实证化的研究原则，只有那些经过多次验证的研究成果，才能被承认为科学的真理。因此，政策决策的制定应当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讲道理”。

教育研究应当致力于挖掘客观事实，通过实证方法来验证教育规律，以此来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从而有效地解决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申教授进一步指出，尽管有些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如果它们的研究焦点与当前政策决策者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那么这些研究成果同样可能面临被忽视和难以应用的困境。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需要保持密切沟通，确保研究成果能够真正满足政策制定的实际需要，这样才能提高研究成果的采纳率，从而更好地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教材建设和管理的经验与思考

（一）教材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启示

接下来，申教授开始分享他在教材管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他首先着重指出，教材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经逐步完善，通过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负责相结合的高效管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此外，管理方法也在不断地优化和改进，经过了三大发展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是教材管理的规范化，中央和教育部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方针，如《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 年）》、《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等，有力地推动了教材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让教材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第二阶段就是教材管理的体系化发展，以中小学教材“一规划四办法”的管理基本架构为例，首先是发布了《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对教材进行规范，然后对教辅、课外读物进行规范管理，制定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待发）、《中小学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两个文件，接着，通过《关于加强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管理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地方和学校自主使用的课程与教材进行了规范，形成了关于中小学教材的完整管理体系，并且这一体系也在不断修订和补充。教材管理工作的不断完善和进步，为我国教育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在前面基础上，推动这些原则性文件的要求进一步细化，转变为具体且可执行的操作规程，比如《中小学国家课程新编教材审核工作细则》对教材编写单位、出版单位、编写人员的资质审核标准、教材的内容、封面、封底及配图审核标准，以及审核的方式、流程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使得教材管理真正有效落地，对于提高教材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申教授进一步强调了加强教材监管和审核工作的重要性，这是确保教材质量的关键环节，只有通过严格的监管和审核，才能保证教材的质量和适用性，从而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对于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深入探讨教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时，申教授特别强调了目前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联性不紧密，存在研究重复出现，新的研究未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实现迭代升级的现象，并且研究者对于未来发展的预见性不足的问题也较为严重。他认为，这种状况的产生主要源于当前的研究者在思考问题时缺乏系统性的观念，对于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不够深入。举例来说，教育改革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再到现在的再中心化的演变过程，同时，教材管理体制也经历了从完全的国家统一制定，到部分审定制，再到如今混合制的变化。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全面理解和掌握教育发展的整个历程，以此来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策略。

申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教育研究目前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识体系方面的不足。虽然教育研究具有普适性，但教育本身却具有很强的文化区域特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的经验和模式，而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的创新和探索。以当前备受关注的 ChAT GPT 为例，它起源于西方，并在该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申教授认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在创新教育体系方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力，我们还没有站在更高的社会发展层面去全面审视教育问题。

在人类社会已经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思考和回答如下问题：未来个体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在 AI 时代，劳动教育应该如何开展？学校的组织形态将会如何变化，课程应该如何设置，学习方式会面临哪些变革？数字教材应该如何开发和管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新时代教育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方向。申教授强调，只有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才能为我国的教育决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教育研究者应有意识地去拓宽研究视野，提升研究深度，以期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大潮中，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